

## 传记必须回归史学

◎ 李健健

**摘要：**中国传记自古“史传合一”“借传窥史”，实录考信，恪守真实性是其契约精神。受西学影响，胡适为“给文学开生路”，以史传为突破口，使其脱离史学进入文坛，并定义为“传记文学”。自此，百年来传记文学充斥着虚构、臆想、“着骷髅于血肉”。传记是个人的“信史”。当今，传记必须回归史学，建构自己的“传记学”，传记才能背离荒谬、回归正途、传递“信史”。

**关键词：**史传 传记文学 契约精神 回归 传记 个人“信史”

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传记发展历史，自古以来“史传合一”为其重要的表现形式，“借传窥史”是我们学习历史的主要途径。一百多年前，西方出现了“新传记”，受西学影响，中国传记被迫转向文学领域，并冠以“文学”的高帽——“传记文学”。“着骷髅以血肉”便是一些文学家对历代传主虚构、臆造和想象的豪迈誓言。传记演变成“传记文学”，企图“给史家做材料，为文学开生路”。传记的本质是“特定人物的生平”，是个人的信史，真实性是其恪守的原则。“传记文学”的出现使传记陷入“假大空”的泥淖而难以自拔。为此，传记必须回归史学母体，才有可能踏上属于自己的金光大道。

### 一

“传记为满足纪念的天性而诞生”。早期人类以挽歌、史诗、传奇、神话等形式纪念部落英雄，中国传记来源于氏族崇祀的尊祖文化。

传记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代。以司马迁《史记》为标志，“专记一人为一传者，则自迁始。”“叙一人之始末者为传之属。”梁启超提出人物传记以“人的专史”为要。英国文艺批评家约翰·德莱顿认为传记是历史学的一种类型。他说：“历史学主要分为三种类型：连续大事记或编年史；可严格称谓的历史；传记或特定人物的生平。”约翰·德莱顿是17世纪在英语中第一个使用“传记”一词的人，他的“特定人物的生平”的定义在西方学术界长期被称为对“传记”的经典表述。

传记的基本原则是真实性。司马迁在《史记》中就主张“考信”，要核实材料的可靠性、真实性。比司马迁晚200多年的西方古典传记的代表人物普鲁塔克，在其《希腊罗马名人传》中明确指出，“人物生平”不同于历史学著作。他说：“我写的不是历史而是‘人物生平’。最显赫的业绩不一定能表示人们的美德或恶行，而往往一件小事，一句话或一个笑谈，却比成千上万人阵亡的战役，更大规模的两军对垒，或著名的围城攻防战，更能清楚地

显示人物的性格和趋向。因此,正如画家通过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的面孔和眼神,就能画出逼真的肖像,而无需斤斤计较人体的其他部分一样,我也必须得到读者的许可,俾能专心致志于人物灵魂的特征及其表现,并借此描绘每个人的生平事迹,而将他们赫赫的战功政绩留给别人去写。”

由此看出,中西传记的异同。“史传合一”是中国的史学传统,即以人物传记为历史重心。自汉代起,中国传记一脉相承,大多以千字左右的短篇文言文为传记篇章。西方传记家则认为,历史与传记分离,历史不是众生相,不可以视为传记的汇总。历史是军国大事、典章制度的综述。

记载一人一世的事迹,以传于后世,这是中西传记共同的“信史”追求。真实性原则之外,传记家的文学造诣可谓大鹏展翅高飞之另一翼。真实性与文采飞扬的叙述是传记引人入胜、脍炙人口、世代相传的法宝。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感叹,“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的确,传记无文不传,这里的文或文采是精准、是深邃,是传记家诗词歌赋、才学识、文史哲等学养的长久积淀。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写道,“然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司马迁为肩负良史之责做了充分准备。自汉初以来,汉朝政府注重搜集先秦古书。司马迁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作为太史公的司马迁可谓遍读天下史籍经典。他读古人书,每有所感,常会废书而叹,甚至为之流涕。同时,司马迁还完成了人生的两次壮游,采访搜集史料,考核历史事实,探究胜败得失、兴盛灭亡。他在《屈原贾生列传》的太史公曰中感叹:“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司马迁如此积累沉淀、游历考察,甚至饱受厄运与苦难之后,才有了《史记》再现历史人物的辉煌成就。

班氏父子论司马迁,后来者范晔评议司马迁、班固父子道:“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被称为史学领域的四大名著,其作者无一不是学养丰厚,文采高妙的良史之才。班固是一位富有才华的良史,曾参加《东观汉记》的写作,接触到丰富的文献史料。范晔极为重视史传的审美功能,强调传记的艺术性。他的传记大都写得富于文采、叙事简洁、文字研炼、骈偶相济、音节铿锵、疏朗流畅,文蕴于史传的“精意微旨”力透纸背。《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为西晋史学家,少时受学于同郡古史学家譙周,“聪警敏识,属文富艳”。陈寿曾潜心钻研蜀汉史事,撰写了《益都耆旧传》。陈寿的文笔以质直、简洁著称。《三国志》中有些人物风韵神态、流光溢彩,一批如关羽、张飞等“强挚壮猛”之辈,成为三国时期勇武忠义的代表,且“身后数百年,亦无人不震而惊之。威声所垂,至今不朽。”陈寿为文,结构跌宕精妙,错落参差,形式灵活。刘勰于《文心雕龙》中赞曰:“惟陈寿《三国》,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

同样,在西方史学界,普鲁塔克的人物传记由于细致入微的人物刻画和引人入胜的故

事情节,赢得了世代读者的赞赏,成为流传最广的古代传记名著。

普鲁塔克搜集了极为丰富的史料,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引用了大量古代历史、哲学、诗歌等,其中有很多是早已佚失,后代无从见到的珍贵文献。如《梭伦诗拾零》,古希腊诗歌残篇和几部现已失传的欧里庇得斯悲剧。此外,他在传记中还写有大量丰饶多彩的传闻轶事(其中大部分是亲自采访所得),为历史文献库藏提供了数量可观的宝贵史料。

奇文轶事和隽语名言,是普鲁塔克重视传记的艺术性,“取悦与提高”读者,“寓教于乐”的价值追求。普鲁塔克是罗马时期的希腊语作家,他的写作文体主要是阿提卡体与希腊语的混合。阿提卡体是流行于雅典的古希腊文体,以流畅优雅著称。这就使普鲁塔克善于讲故事的才能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得以充分发挥。普鲁塔克的行文清晰流畅,节奏优美。这种纯朴、清晰、晓畅的文体,在欧洲各种语言的翻译中,都能够充分表现原作的文体特色,并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在史诗时代告别的钟声即将响起,小说体裁尚未兴起的漫长岁月里,普鲁塔克和他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是非凡和卓越的。据说有人问17世纪古典学者西奥多·加札,假如学术典籍面临一场沉船的灾难,而他只能保留一位作家的著作,那么他将保留谁的呢?回答是:普鲁塔克。理由是:留下了这位作者,也就留下了一切。

## 二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传记。中外传记领域在出现《史记》《希腊罗马名人传》之后,一直以其为摹本,秉持真实性原则,恪守秉笔直书、褒贬自见的实录精神。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实录了各个朝代的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并成为教化、激励、温暖后世民众的精神灯塔。不可否认,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加速,枯燥乏味,毫无生气,史料汇编类的中外传记已显得百弊丛生,不合时宜。

20世纪初,科学的进步和各种理论学说的涌现,使社会、人心陷入变革与疯狂的境地。否定、颠覆、解构偶像,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新传记”的表征。

“新传记”的代表人物雷顿·斯特拉奇倡导新柏拉图主义和个人的审美高于一切的穆尔伦理准则,新柏拉图主义与维多利亚时代神性高于一切、权威高于一切的价值观背道而驰,在当时被认为是叛逆者。他尖酸刻薄,嬉笑怒骂,在传记里“想嘲讽什么就嘲讽什么”。

他违反传记传统,张扬艺术领先。他的《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以代表维多利亚时代精神的4位名人为传主,单独成篇,汇集成书。他们分别是红衣大主教曼宁、护士天使南丁格尔、小学校长汤姆斯·阿诺德和戈登将军。他们是维多利亚时代在宗教、博爱精神、教育和军事领域的精神偶像。

斯特拉奇运用讽刺、比喻、解释、心理分析等技法丑化传主,褻渎灵魂。《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出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期。斯特拉奇把对战争的痛恨以讽刺的形式诉诸笔端,将战争意象引入传记。他把传记作家和传主的关系比喻成敌我关系,写传记好比一场战斗。他教唆传记作家:“他(传记作家)若是聪明,就会采用更巧妙的战术。他会向传主意想不到之处发起进攻;他会从侧翼或后翼猛扑过去;他会往传主尚没有被美化的

隐秘暗处突然射去雪亮的探照灯。”

他把曼宁主教比喻成老鹰，把南丁格尔也比喻成凶猛的鹰，他说南丁格尔的父母“养育的不是一只天鹅，而是一直鹰”，形容她像一头母老虎，在她给上级的报告里，“挖苦话像机关枪一样扫遍各级官员，毫不留情，往死里打。”他讥讽嘲弄戈登将军，写苏丹阿拉伯人攻下戈登的宫殿，将他的首级挂在大路边的树上，让愤怒的路人向那头颅扔石头。“沙漠上的猛禽在这颗头颅上方飞掠，盘旋——这正是那对蓝色眼睛过去经常观望的那些苍鹰。”

斯特拉奇不拘一格、打破传统的传记写作风格，让俗皆爱奇的读者耳目一新。但质疑声也不绝于耳。他的《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是对权威和传统的反叛，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认为：“他对英国古老价值观所造成的破坏是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无法做到的”。同时，也永远改变了人们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评价，斯特拉奇被称作“推倒偶像者”。他的反对者嗤之以鼻，称其传记为浮浅之人的浮浅之作。

“新传记”的另一代表人物是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她首次使用“新传记”一词，意指现代派有别于维多利亚时期传统传记的新型传记。“新传记”的主要要素是：强调传记作家的主体性、主张传记从选材到叙事必须具有艺术性、提倡心理阐释、缩短传记篇幅。

伍尔夫发表过3部风格迥异的传记：《奥兰多传》《弗拉狮传》《罗杰·弗莱传》。她与斯特拉奇等“新传记”作家一样，把传记变成实验品，以此表达自我，美其名为虚构性或幻想性“新传记”。她的《奥兰多传》虚构传主奥兰多出身名门望族，生活在伊丽莎白时代，后出任英国驻土耳其大使，昏睡数日醒来后变为女儿身。结尾处，奥兰多结婚生子发表诗集，时空跨越350年。

针对这一荒诞传记，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从传记理论的角度，认为这是一部“为传记作家写的寓言”，属于一种“更为松散、更为自由的传记”，体现出伍尔夫企图“一夜之间给传记带来革命”的努力。

《弗拉狮传》是伍尔夫用传记开的另一个玩笑。她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写完小说《海浪》之后读到布朗宁的情书，突发灵感，要为他们夫妇的狗写一部传记，借此跟斯特拉奇开个玩笑。”

之后，德国“新传记”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出版了《尼罗河传》。

实际上，在伍尔夫心间，作为现代派小说家的身份远远胜过传记家，而现代派的重要特征就是对传统文学方法的背弃。可是，对传记持游戏心态的伍尔夫，至今，还被视为“对传记有着深刻理解的理论家，她的有关传记的论文至今仍然是这一领域中最重要论著之一，她对‘新传记’的评论还在为传记史家所引用。”

在“新传记”出现之前的19世纪末，西方历史学理论蓬勃兴起，学者们发现传记同历史学有所区别。1886年，美国学者菲利普斯·布鲁克斯提出：“传记，就其真正含义来说，是生平的文学，特别是个人生平的文学。”

1918年，《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出版。1928年，初版《牛津字典》把传记界定为：“作为文学分支的个别人的生平的历史。”

此后，另一部权威著作《不列颠百科全书》也坚持相似的学术立场，并对“传记文学”作

如下定义：作为最古老的文学表现形式之一，它吸收各种材料来源、回忆和一切可以得到的书面的、口头的、图画的证据，力图以文字重现某个人——或者是作者本人，或者是另外一个人的生平。

中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变法图强的激烈冲突后，为发展近代教育，提倡出国留学。梁启超、胡适、朱东润、郁达夫等先后走出国门，他们拓展视野、学成归国，为中国传记从古典到现代的交替过渡时期，做出了开创性努力。

梁启超以毕生精力推动中国的启蒙运动，由于他的倡导，从戊戌维新到“五四”运动前后，传记写作蔚然成风。梁启超不仅写短篇传记“新民启智”，也效仿西方人写出了长篇传记《李鸿章传》。他在中国旧学和新学的过渡期，始终把传记列入历史学。他对传记的要求是：“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记个人之言论行事及性格”；“凡记述一个人，最要紧的是写出这个人与别人不同之处。”

胡适在美国求学苦读，并对中西传记进行了思考和比较，分析了它们的优劣，强调传记应当揭示传主的“人格进退之次第，及进退之动力。”他提出了“传记文学”和“自传文学”这一概念，提倡写“有历史性质、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文学。”

他在给中国古代传记分类的时候，没有说到以《史记》为代表的“二十四史”中的传记，似乎是在表明一种观点：正史中的传记和“传记文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过胡适的观点是在不断修正的，20年后他在台湾师范学院所作的另一篇著名演讲《传记文学》中，就提到《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正史，他还说：“《晋书》收集了许多小说——没有经过史官严格审别材料——成为小说传记，给中国传记文学开了一个新的体裁。”这里可以看到，胡适已经把正史中的传记，即所谓“史传”同其他传记形式一道通称为“传记文学”了。<sup>①</sup>

胡适作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旗手，有力地推动了传记文学理论和传记文学的发展。“如果说中国古典传记向现代传记的转型是从梁启超开始的，那么是由胡适完成的。他们两人的贡献最大——梁启超与胡适两代人的努力，为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传记创作的繁荣做了准备。中国现代传记繁荣的最初表现是大量自传和回忆录的出现。“五四”新文学运动带来了知识分子个性的解放，写作接近西方传记体式的自传或回忆录成了作家们自我表现和自我张扬的一种最方便的形式。”<sup>②</sup>

胡适说，“2500年来，中国文学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从英国留学归来，酷爱鲍斯威尔所著《约翰逊传》的朱东润也说：“平心而论，传叙文学在中国文学中实为不甚发达之部门。”深受卢梭《忏悔录》影响的现代作家郁达夫认为：“传记作品应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写来”，“他的美点，自然应当写出，但它的缺点与特点，因要传述一个活泼而且整个的人，尤其不可不书。”

郁达夫1933年发表《传记文学》一文，朱东润1941年发表《中国传记文学之进展》一文，他们赞同胡适的观点，进一步肯定了传记的文学属性。他们的倡导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有这些知名学者和作家的强力推动，所以传记脱离史学范畴，归入他们认同的文学领域，并在传记写作中把各种文学的方法和理论引入传记，传记的文学特征越来越鲜明。传记文类的归属从此由史学领域进入了文学领域，尽管也有学者强调，传记文

学是历史和文学相结合而产生的宁馨儿。传记被拖入文学领域的厄运,是传主们的噩梦,传主无论生者或是逝者,都被文学搅拌的彩泥涂抹得面目全非;也有人剽窃成书,如同捡拾各类破布缀成衣,垒成一摞做著作等身状;更有甚者,头顶古代伟人的大名,凭借有限的史料和文献,臆想自己就是那伟人那豪杰,并向世人炫耀自己内心的狂野。

100年前,里特·斯特拉奇就上演过此类丑剧。他在自己的传记作品《伊丽莎白与埃塞克斯》中,丰富地想象了女王和伯爵间的“私情”,斯特拉奇与传主伊丽莎白相距400多年,岁远易诬,史料匮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伊丽莎白与埃塞克斯》背离了传记的真实性原则,虚构臆想了传主的人生。斯特拉奇的朋友说,斯特拉奇把自己写进了传记,在伊丽莎白与埃塞克斯的身上分别投射了自己的影子。斯特拉奇乐此不疲地评价伊丽莎白时代的政府制度、司法制度和社会制度,这些其实是现代人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这部悲剧史包含了相当多斯特拉奇的自传成分。<sup>③</sup>后世美国传记名家道格拉斯·弗里曼义愤填膺地谴责:“我认为,对我们这代人所犯下的所有的弄虚作假中,这部‘心传’可以说是罪魁祸首。”

### 三

胡适所倡导的“文学革命”促进了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用白话做一切文学的工具”是胡适找到文学革命的突破口与落脚点,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初始阶段恰逢白话文运动的兴起。之前,胡适已经比较了中西传记,他指出:“东方短传之短处:(一)太略。所择之小节数事或不足见其真。(二)作传太易。作者大抵率尔操觚,不深知所传之人。史官一人须作传数百,安得有佳传?(三)所据多本官书,不足征信。(四)传记大抵静而不动。但写其人为谁某,而不写其人之何以得成谁某是也。吾国人自作年谱日记者颇多。年谱尤近西人之自传矣。”<sup>④</sup>

胡适以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他从1920年代起直至去世,始终不遗余力地倡导传记文学。他曾动员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等人写自传留给后人。他提出传记应有远大的识见,细密的考证和传神的手笔。

他以《四十自述》实践自己的传记文学理念。他在自序中写道:“我本想从这40年中挑出10来个比较有趣味的题目,用每个题目来写一篇小说式的文字,略如第一篇我的父母的结婚。这个计划曾经得死友徐志摩的热烈的赞许,我自己也很高兴,因为这个方法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并且可以让我(遇必要时)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写一些太亲切的情绪方面的生活。但我究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写完了第一篇,写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觉地抛弃了小说的体裁,回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了——因为第一章只是用小说体追写一个传说,其中写那太子会颇有用想象补充的部分,虽然董人叔来信指出,我也不去更动了。但因为传闻究竟与我自己的亲见亲闻有别,所以我把这一章提出,称为‘序幕’——我很盼望我们这几个三四十岁的人的自传的出世可以引起一班老年朋友的兴趣,可以使我们的文学里添出无数的可读而又可信的传记来。”<sup>⑤</sup>

胡适说自己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他提倡传记文学“纪实传真”“传神写生”，而他在《四十自述》的第一篇就以小说式的文字写他父母的结婚，还用假的人名地名，这显然是一个悖论。传记、自传这一文类区别于小说、传奇的就是恪守真实性原则。与传主相关的一切都应该是真实可信的，传主所处的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习俗、人名、地名等等都必须真实可觅。否则，自古以来的历史学家、传记家踏访古战场，采访传主后世子孙，感悟历史波澜壮阔的古迹遗址都不复存在了？胡适的董人叔来信指出，这位董人叔是知道事实了解真相的，指出胡适作假。胡适表示：“我也不去更动了。”

胡适自己也说他经常很诚恳地劝那些在某领域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人写自叙，其目的是希望替将来的史家留下一点史料。史料必须是真实可信的，胡适不可能不清楚。可是已经在《四十自述》第一篇作伪的胡适竟然把此作品给“敌对一方去审阅”。

“他写《四十自述》时已是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著名教授，名扬天下，但他写得相当坦率，没有隐瞒自己一些不光彩的经历。他为了保证史实的真实性，居然写成之后交给当事人中的敌对一方去审阅。如写到中国公学风潮事件，胡适写成后，‘恐怕我的记载有不正确或不公平的地方，所以把原稿送给王敬芳先生，请他批评修改。他是我们攻击的干事之一，是当时风潮的一个主要目标’。结果，王敬芳都承认胡适‘说得非常心平气和’”。<sup>⑥</sup>

胡适历来要求传记“纪实传真”，传记文学要“传神生动”，要能“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胡适的上述行为违背真实、真诚，自我解构其传记学说。

胡适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进行“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等无疑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但是，把历史范畴的史传拖入文学领域，在今天看来，可谓犯了严重的理论和方向性错误。传记与文学本身就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领域，文学中的戏剧、诗歌、小说等文类，是虚构想象的艺术产物，虽然强调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那环境和人物是作者信马由缰“忠于人生”的创作。传记在成为传记文学之前，隶属于历史的范畴。传记的准则是真实客观地实录一个人的生平、个性、轶事，必须实有其人其事，传记作者的写作必须信实细致地“忠于其人”。

忠于人生，不必真有其事；忠于其人，必真人实事。传记与文学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情。更何况传记还有契约精神的伦理约束。

比如自传，什么是自传？其定义为：一个真实的人以其自身的生活为素材用散文体写成的回顾性叙事，它强调的是他的个人生活，尤其是他的个性的历史。<sup>⑦</sup>

自传契约是一种“坦诚性”的精神契约，是作者和读者间的一种暗含的契约，是一种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体裁，是一种“信用”体裁。自传是同一、是原型。同一是由三项确定，即作者、叙述者和人物。自传契约就是在文本内部对这种同一的肯定，它最终代表的是封面上作者的名字。同时，自传者应该警惕的是，读者经常把自己当作侦探，努力搜寻违约之处。

菲力浦·勒热讷还告诉我们传记与自传的区别，“现在我们已经发现，使传记和自传产生根本区别的原因就是相似关系和同一关系的主次问题。在传记中，相似为主，同一为次；在自传中，同一为主，相似为次。同一是自传的真正出发点，而相似是传记无法企及的境界。”传记是他传，传记家努力趋近真实，如其所是地呈现传主。

自传这一体裁不是卢梭“发明”的,但是他一下子挖掘出了它的几乎所有潜能。他的《忏悔录》不仅是第一部自传,而且从历史的角度看,因为《忏悔录》写于1762至1770年间,相对于当时的文明来说,它也许是最为大胆的一部自传——卢梭一下子使该体裁达到一种完美的高度,也改变了该体裁的历史进程:此后,不论是谁,只要他准备写自己的生平,就会想到卢梭,不管他是想模仿他还是想批判他。人们不得不以卢梭为参照了。

中国“五四”运动前后,先觉的知识分子对外要求复兴中华,对内开始忏悔,真诚面对人性的善恶,内心的苦闷,并对人生进行深度剖析。尤其受卢梭《忏悔录》影响,中国一批作家和学者纷纷写出自传。实际上是他们推动了自司马迁《史记》之后传记史上的第二次繁荣,也可称为第二座高峰。代表人物有郁达夫、鲁迅、巴金、郭沫若、瞿秋白等。

郁达夫在现代作家中,最早关注传记文学。他曾提出,“我们现在要求有一种新的解放的传记文学出现,来代替这刻板的旧式的行传之类。”他在1926年出版《日记九种》,对自己进行大胆解剖,在中国传记史上是第一次,也是中国现代第一部作者生前公开出版的私人日记。

中国传记文学的另一强力推手是朱东润。朱东润是一位严肃的现代学者。他是真正把人物传记写作当作“文学”的一个门类而进行切实研究和实践的。他经过对中外传记文学的认真比较,先后完成了《中国传叙文学底进展》《传叙文学的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述论》《传述文学与人格》等论文和长达十余万字的专著《八代传叙文学述论》。这些研究成果填补了中国古代传记研究的空白。同时,朱东润有感于中国传统传记观念的局限,以及确立新的传记文学范畴的迫切需要,开始对这一理论作进一步研究。

他提出了现代传记文学诸原则,构建了能适应国情的传记文学理论框架。具体表现为:(1)传记文学是介于史学和文学之间(或者说是史学和文学的结合)的一门独特的艺术样式。这就使传记文学从史学中解脱出来。(2)写作传记文学的主要目的,是刻画人物变动不居而又前后连贯的性格,并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及其内在逻辑予以深刻的再现。朱东润多次谈到中国传统传记写作的弊端之一,便是直奔史实而忽略人物性格的刻画;有些传记即使在某种程度上刻画了人物性格,亦多为平面的、僵滞的,常常是好人出世便是好人,坏人生成便是坏蛋,这样的传记是不可能具有艺术感染力的。(3)从事人物传记的创作,要尊重历史的真实性原则,传记作者在反映历史真实面貌的同时,又应该有强烈的历史感渗透其间。把历史的真实性作为传记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原则。

朱东润要求在真实地反映历史本来面目之外,还要兼顾国家利益、民族情绪。因此,他说:“我们之所以要在西方现代传记家所提出的‘真实、个性、艺术’之传记要素之外,又加上了‘祖国’这一要素,因为我们深知自19世纪起,自己的祖国因为腐败因循,终于成为极衰的国家……”<sup>⑧</sup>

朱东润在传记文学实践中,除了以假托的手法为在“文革”中不堪折磨、以死相抗的妻子写传。他自20世纪40年代相继出版了《张居正大传》《陆游传》《梅尧臣传》《杜甫叙论》《陈子龙及其时代》《元好问传》等。不难看出,这些历史人物都是他在运用史料与文学相结合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朱东润是一位文学史家。自古,中国绝大多数史官都是依据文献撰写传记。历史学家在区分小说传奇与史传时强调,“唯传奇之言情情节可决之于



作者,而史传之言行必决之于文献。”

白话文的长篇传记文学若决之于文献,翻译、想象、虚构的成分必不可少。此类传记文学观念的倡导和沿袭必定为改革开放时期的传记文学留下虚构、臆想的理论依据。

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涌现出大量的传记文学,出版数量年年攀升。与世界潮流相呼应,传记、亚传记、以及传记理论都得到空前发展,形成了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的第三座高峰。然而,传记文学领域的现象却是数量繁多,精品鲜见。这一怪现象无不与传记脱离史学范畴被迫进入文学领域有关。

#### 四

中国传记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前,其表现形式大多为文言文短篇传记或短篇合传,另外,诔文、行状、墓志铭等也属于传记范畴。它们的基本特性是传主逝世后,史官依据史料和文献撰写而成。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外来文化蜂拥而至,“对西方传记文学理论和传记名作的译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界的一个炙手可热的热门话题。”<sup>⑨</sup>

西方传记文学,尤其是卢梭《忏悔录》的传入,为喜爱传记的郁达夫开辟了新视野。他曾批评旧传记道:“传记文学,本来是历史文学的一枝,中国自太史公(司马子长生于汉景帝时,当在西历纪元前154年前后)作《史记》后,才有列传的一体。释文传,传世也;记载事迹,以传于世。所以中国的传记文学要求其始祖,只能推司马迁氏为嚆矢。其后沿这系统一直下来,经过了二千余年,中国的传记,非但没有新样的出现,并且还范围日狭,终于变成了千篇一律,歌功颂德,死气沉沉的照例文字;所以我们现在要求有一种新的传记文学出现,来代替这刻板的旧式的列传之类。”

郁达夫身体力行以《日记九种》等作品与胡适积极倡导的传记文学相呼应,影响并推动了同时期自传文学的繁荣发展。

当今,在世界范围,21世纪被称为传记文学的世纪。中国传记领域依然存在依靠文献、史料虚构古代名人;传主已逝,凭借采访遗孀、子女、同事或资料建构传记文本;传主健在,未经同意,剽窃剪贴他人著作,大传全传横空出世;成立传记小组,每人一块,堆砌史料,拼接成传。

以上种种怪现象,皆违背了传记的真实性原则。事信不诞,秉笔直书的史官操守荡然无存。即便在古代,士大夫阶层对史官令传主升天坠渊的失实行为也切齿痛恨。钱谦益曾说:“其或敢阿私所好,文致出入,曲笔以欺天下后世,不有人祸,必有天刑!”

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指出:“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sup>⑩</sup>

自古以来,史官及其史传作品都受到严格的监督和批评。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反对文人修史,他认为文与史“较然异辙”,“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文士恰恰相反:“史体述而不造,史文而出于己,是为言之无征。”明代曾有:身非史官,不可为人作传之说。

在历史上如此严肃严谨的史传文类被强行拖入文学领域，冠以传记文学的名号，传记作家对远逝传主的臆造、杜撰，凭虚御风地遥想，能称得上尊重和敬畏吗？传记受西学之风影响，于“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摆脱历史，进入文学领域，但其本质源自历史，历史是传记的母体。今天，传记只有回归到历史的范畴，遵循自己的属性和原则，传记才可能在自己的天空下茁壮成长。

我们静心沉思，传记最重要的应是实录鲜活的传主命运，不是死寂的文献、史料。传记家应该去面对活生生的传主本人，与传主面对面深度沟通采访，传主的命运轨迹、内心世界、社会关系、各种轶事和个性追求等等才能次第显现表露。

实际上，传记家只属于自己的时代，不属于任何别的时代。我们今天得以知晓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是因为有一代代史官呕心沥血不辱使命。当下，人类科学革命的五大成就之一“系统科学”，又为我们更好地认识人本身提供了新的维度。“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系统之一，人性是最复杂的一种属性。人是社会的最小单位，是社会的原子，是社会的细胞，社会的全部秘密都潜藏在人身上和人心里，只有未来把人研究透了，人类才会真正懂得社会及其历史。”<sup>①</sup>

传记家要面对的传主是世上最复杂系统之一，其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生命特性，是不能依靠想象和虚构呈现其立体多面的人生。哲学家闵家胤强调人都有心灵系统：人之为人就在有心，就在有这团灵明——知存在、知意义、知对错、知善恶、知美丑、知正义之心。心的独特功能是创造，是无中生有地涌现灵感。心的天职是推进进化。

传主的心灵系统不曾对传记家开放，心灵轨迹和丰富的内涵及其深刻性就无法表述其精神力量，传记的励志和潜在的教化作用就难以与读者产生心灵共鸣。我们如何认知传主？在人类认知系统中，主体一开始就是主动的接受者、识别者、分析者和整合者，也就是主动的透视者和主动的构建者，而不是被动的反映者。然而，“任何一个主体都是一个站在某个视角的带着有色眼镜的透视器，因此，只有通过多元透视整合才能获得真相。透视论是当代科学已经采用的认识论，最典型和最令人信服的就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体现的认识论原理。相对论证明，即使是‘时间’和‘空间’这两个最具客观性和绝对性的概念，其实也是随参照系改变而改变并具有主观性和相对性的。”<sup>②</sup>

人是进化的多元的，是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性向多样性发展的过程。当我们决定写作某人传记的时候，也要有一点系统哲学的常识。我们面对古代名人、不曾谋面的传主和一位活生生的传主，我们如何选择？古代名人，我们可能仅仅知道他的名字和业绩，他们真实的长相我们大都无从知晓，此类传记出现的样式只能是作者头顶“纸糊的帽子”，上面书写着传主的名号，人生经历，思想情感、个性轶事都是作传者自身的经历，而非传主的实际人生；不曾谋面的传主，可能是逝者也可能是生者，作者描摹的传主如同是一幅画像，可以有文献、史料，也可以剽窃成书，这类传记的意义和价值究竟几何？

只有当我们面对一位活生生的传主，深度地沟通采访，详知他的生命轨迹和内心的起承转合，还有与他相关的无数次传主。传主的个性脾气、思想情感及地域风俗浸润的秉性等等才会相继呈现。传主有多么复杂，传记就有多么繁杂。这是传记家应有的传记意识。这一传记意识的前提决定：传主与传记家是同时代共时空的，传主与传记家必须面对面，

以真实的契约精神确保传主个人信史的价值存在。

让什么人写自己的传记,传主是要慎重选择的;写什么样的传主更有传世的价值和意义,传记家同样也要给出正确判断。通常传记家愿意为同时代的非凡人物立传。这类卓越人物一定是为本民族或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

200多年前,英国的鲍斯威尔就以《约翰逊传》为传记家作出了榜样。

在西方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启蒙主义者要求遵循“自然”法则,真实、客观地呈现传主的实际人生。传主生平、个性、轶事的立体多面,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地自然展现已被《约翰逊传》成功实践。

1791年,鲍斯威尔的《约翰逊传》出版,可谓奠定了英国乃至世界传记领域的里程碑。鲍斯威尔与传主相识21年,在两年多的时光里朝夕相处,面对面地深度交流沟通,对传主的个性、心灵、轶事都了然于胸。以大量的生活琐事、人性故事、言行举止等生命花絮,如绣花一般,一针一线精心织就了同时代的文学巨擘约翰逊博士。《约翰逊传》不仅轰动一时,而且对后世的传记发展都有着深远影响。

当今,美国的《乔布斯传》可谓畅销全球。乔布斯生前请传记作者为自己立传。他们面对面和盘托出的真诚交流近50次,传记作家采访了乔布斯的亲人、朋友、同事、对手上百人。唯有这种前期丰厚的素材累积才成就了《乔布斯传》的面世。

鲍斯威尔对传主约翰逊的一言一行进行细致入微的记录,后人力图模仿他的写作,但苦于缺乏鲍斯威尔那样细腻的笔法,也无法如鲍斯威尔那样孜孜不倦地大量收集传主的生平素材。于是,以卢卡特和柯尔律治为代表的浪漫派反对鲍斯威尔式的传记,认为传记家也是艺术家。这一思想与之后的“新传记”和中国的“传记文学”一脉相承。

从史传到传记学的历史沿革,我们不难发现,胡适倡导传记文学,是为他的新文学运动寻找另一突破口。他坦诚自己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而中国传记自《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之后,并没有大的发展。胡适之前,有梁启超以传记鼓舞激励民众,“以文参政”慷慨激昂地歌颂英雄、涤荡人心、引领风气。胡适在新文学运动中,提出传记要“给文学开生路”。可是,传记属于史学范畴,并有两千多年相伴相生的契约精神,其真实性原则不容违背。

传记的可读性并非依赖文学的虚构与臆想。“五四”之前的传记,大都是对传主盖棺定论、生不立传的产物,死气沉沉、枯燥乏味。当今,传记已是长篇专著,传记家要写出传主的精气神和生命轨迹,若不对传主面对面长时间采访,不深知详知传主,我们无法完成真实、可信、感人的传记佳作。

传记不是“给文学开生路”的,文学的生路要靠文学家自己开辟。传记是特定人物的“信史”,传记家和读者关注的是特定人物多元进化的成长轨迹,及其内在的精神力量和卓越成就。传记回归史学不容置疑。随着时代变迁,历史学划分得更科学更细致,传记如同“档案学”一样,应该建构自己的“传记学”。

纵观古今中外,历史上不乏优秀的传记作品,其根源与传记家个人“才学识德”的厚重深邃紧密相连。当下,传记唯有回归史学,恪守真实性原则,传记家才能拥有成长的沃土,传记佳作才有望迭出并代代相传。

注释:

- ① 杨正润:《现代传记学》,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4 页。
- ② 萧关鸿编:《中国百年传记经典》一卷,东方出版中心 2002 年版,第 5 页。
- ③ 唐岫敏等著:《英国传记发展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81 页。
- ④ 《胡适传记作品全编》第四卷,东方出版中心 1999 年版,第 200 页。
- ⑤⑥ 萧关鸿编:《中国百年传记经典》,东方出版中心 2002 年版,第 301 页、第 298 页。
- ⑦ [法]菲利浦·勒热讷:《自传契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年版,第 201 页。
- ⑧ 李祥年:《传记文学概论》,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1 页。
- ⑨ 陈兰村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语文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30 页。
- ⑩ 刘颀:《文心雕龙》,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8 年版,第 32 页。
- ⑪⑫ 闵家胤:国图公开课讲稿,2016 年 10 月 23 日。

(李健健,女,60 后,安徽人,文学博士,复旦大学博士后,解放军日报社高级记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及人物传记)